

討論意見

陳 威璿 (CHEN Wei-Chin) *

1. 研究者如何逾越二十世紀的框架？——地域與人

關於東亞人文社會研究學者在當前的任務，也就是應該以地域與人，而非從國家與民族的角度出發來思考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意識呼應了東亞目前在「和解共生」方面的重重困難。這種困難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天下」帝國體制以及西方現代化的影響。

「天下」帝國體制表現在中國的漢朝、唐朝、明朝，與週遭鄰國產生衝突，不只是抵抗外患，更進一步想要成為秩序中心，控制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國家。在西方文化影響東亞之前，中國確實有資格成為東亞地域最大的文化輸出國，甚至歐洲也曾經在十六到十八世紀前期，透過傳教士的交流，產生一股中國文化風潮。即便是今日的韓國和日本，中國文化對傳統的影響仍然不可能忽略。但也因此，中國作為文化與秩序中心，同時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應。明朝滅亡後，朝鮮在政治上雖然不得不維持對清朝的朝貢關係，但私下以「小中華」自居，在文明的層面上複製了成為秩序中心的渴望。在日本方面則導致了更嚴重的後果。例如日本古代有「征韓」的思想，《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成為後世的歷史依據，也實際影響東亞地域的形勢。明朝的「萬曆朝鮮之役」，在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在朝鮮稱為「壬辰倭亂」，從稱呼即可看出其中包含的仇恨。明治維新後，日本在文明開化的自信下，再加上舊士族失業問題需要解決，也開始進行對東亞的控制。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的導火線，就是兩國在朝鮮地區的勢力衝突。1895年日本介入朝鮮政治，殺害閔妃（明成皇后），並使朝鮮王朝滅亡（史稱乙未事變），更使韓國的對日本的怨恨達到高峰。其實清朝、明治日本、朝鮮三國在漢字文化圈脈絡下的文化交流雖然豐富，但從未真正動搖以「國家」「民族」為界線的隔閡，也是因為長久以來的歷史原因。其後日本在東亞發動戰爭，造成的影響難以道盡。到現在，靖國神社仍然是東亞的敏感話題，中國大陸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電視劇也始終不斷。其實可以說，戰爭時期日本在東亞的行動，其實也是對取代中國成為秩序中心的渴望，大東亞共榮圈的本質仍然是對「天下」帝國體制的複製。

另一方面，西方的影響打亂了東亞的歷史發展，東亞被迫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現代化。而中國面對無法抵擋的西方入侵，導致國力大幅衰弱，並失去秩序中心地位，也在鴉片戰爭（アヘン戦争）到二次大戰這段期間留下深刻的民族創傷，從此中國無法擺脫「落後」這個形容詞。如今中國在共產黨政權下，經過幾十年來的發展，已經成為足以和歐美抗衡的大國，治療民族創傷成為重要工作，因此也出現「中國模式」之類具有與西方相對抗意涵的想法，背後其實也包含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¹這也使得中國對待東亞其他國家的態度更為強硬。

以上從東亞地域的視角來稍微探討國際間在和解共生上有哪些歷史背景造成的困難。至於各國內部的困難，例如日本內部左翼與右翼的爭執，以及中華民國政權在流亡至台灣的前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

¹ 這種民族主義也出現在中國的東亞儒教研究上。2013年，日本愛媛大學召開「韓國儒學之位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朝鮮儒教の位相に関する研究）研討會，會議論文在2015年由廈門大學哲學系朱人求、島根縣立大學總合政策學部井上厚史合編成《東亞朱子學的新視野》，於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出版。朱人求在該書序言中強調，東亞朱子學研究應以中國為本位。但在出版之前，井上氏對這篇序言的內容並不知情。

後，因為政策的失當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矛盾等等，因為篇幅關係，在此暫時無法討論。總之我認為，如果我們肯定東亞的和解共生有必要追求的話，那麼確實，對「個人悲傷」的想像力、從地域和人出發來進行思考的方式就很重要，這樣我們才能避免由國家和民族這樣的大型結構所帶來的暴力，抹殺個人的存在，或是讓我們永遠無法離開對立的局面。不過另一方面，民族或是國家認同，在今天依然存在，這種認同在歷史上也曾經發揮過正面的作用，它可以用來凝聚群體，也可以用來對抗壓迫，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國家、民族這種概念的出現，也是歷史理性發展的一部分。國家和民族也畢竟是由人組成的，民族的悲傷和個人的悲傷（或是其他情緒）並不相同，但其中也有重疊的部分。還有，我們如何決定「地域」的範圍？為何「東亞」會在「亞洲」中單獨擁有自己的意義？「東亞」文化相對於「西亞」「歐洲」「美國」等地區有什麼特色？這其實也立基在國家、民族範圍所決定的想像空間之上。但這不一定代表道德意義上的缺陷，不如說，對這些問題的相關思考，已經包含了從國家、民族概念而來的歷史背景。就這一點來說，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間無法完全斷裂。

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區分「我們要面對的是什麼問題」，來決定思考的主題。當我們要面對和解共生、面對人際、國際間的正義問題等等之時，從地域與人的角度出發，比較能跳脫國家、民族中心的舊思考的侷限，尋找更適合二十一世紀的答案。相對的，當我們試圖針對文化本身的特性進行研究，尋找超越於個人之上的共同因素時，就不妨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探討。這是我的初步想法。

2. 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支援者是不是國家？

3. 與市民社會應怎樣溝通？

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希望能夠放在一起來提出意見。

安倍政府宣布裁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消息，在台灣這邊也引起一些震撼，人們對於安倍政府的決定感到非常驚訝。不過，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面臨類似的危機，只是政府不會採取這麼直接的作法。就社會的整體風氣而言，重視直接的經濟利益，認為人文社會科學對社會沒有用處的這種「重理輕文」想法十分普遍。其實歐洲、美國等地也有類似的問題，這是全球性的「學術資本主義」現象。

現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是大學，不論國立或私立大學，都作為國家整體文教政策的體現，而獲得來自國家或多或少的資源，也因此容易受到國家的控制。台灣和日本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存在大學與國家抗爭的行為，這是因為學術研究者必須秉持自己的良心，不能只是為政府服務。我認為，國家必須在保障學術自由，允許學者抗議的情況下，支援研究發展，因為學術研究的參與者具有稀少價值，就像重要文化財一樣，不能完全交給自由市場來決定價值。同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能夠在促進世界多元化的同時，藉由自身文化相關的探討，來建立自身特色，也才能使國家具有主體性。這就好比，京都作為日本的重要城市，現代工業發展的歷史也很悠久，今日的車站以南便是重要工業區。但幾乎沒有人會為了工業區而來京都觀光，反而是千年文化形成的氣氛，那些並不直接有用的東西，才使得京都具有世界級的地位。不過，既然國家透過資源來控制學術的狀況依然存在，我們便無法完全期待國家能夠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支援者，必須透過與市民社會的交流，讓社會成為「願意援助人文社會科學」的環境，促成由下而上的人文活力，而非由上而下的指導。

但如此一來，「如何溝通」確實是一大問題。在日本，有對不同價值觀者貼標籤的現象，在台灣也是如此，因為政治立場或是各種問題見解的不同而彼此謾罵的情形非常普遍，不同

立場雙方都會出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也就是說，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環境還有待營造。人民對於學者的精細論述也缺乏興趣，而是習慣根據簡單明瞭的訊息做出判斷。整體的風氣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我認為，我們既需要像西田幾多郎那樣，不受現實影響，專心建築自身的學問世界的學者，也需要願意積極向社會大眾對話，傳播自身研究成果、示範良好的討論態度的學者，政府也不應該以單一標準來衡量學者表現。如此，才能使學界真正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用這樣的方式來取得自身的存在必要性，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為了「人」而存在的意義。

因為篇幅關係，只能先這樣簡單表達自己的想法。請其他討論者多多指教。